

胡秋原

著

古代中国文化与  
中国知识分子

上册

中华书局



胡秋原 著

古代中国文化与  
中国知识分子

上册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胡秋原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0.1

ISBN 978 - 7 - 101 - 06785 - 9

I. 古… II. 胡… III. ①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②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K220.3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9530 号

---

书 名 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  
著 者 胡秋原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7 插页 34 字数 7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785 - 9  
定 价 98.00 元

---

## 大陆版序

《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为先父胡秋原先生精心力著之一。原书完成于1954年,1956年1月由香港亚洲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旋于1958年增印;同年9月三印,均一售而空。其后胡秋原先生得将本书版权收回,1976年将全书重新编辑增修,并加增索引、图片及地图,于1978年4月由其成立之学术出版社在台北发行增订之第二版第四印,旋又于1989年2月发行第四版第六印,不久即又告售罄,现已绝版甚久。由本书在港台出版之历史,可知此书实为一重要学术著作。今承北京中华书局以1989年发行之第四版第六印为蓝本,将本书重新编排,出版发行大陆首版之《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以飨中国大陆学界。

《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之特点在本书初版时之介绍中,有十分贴切的说明:

……此书就形式言,是一部中国通史的古代篇;就内容言,是一部古代中国文化史——一部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与创造活力为中心主体的旧史识……就研究方法言,则是一部比较文化史。作者运用了“同时比较法”,比较东西两方在同一的年代中,有关科学、哲学与文学之水准的高低……本书于两汉史用力最勤;而以西域之开拓与交通史,成就最大……本书作者胡秋原先生,于学无所不窥;尤以对历史与哲学之研究,涵濡最深。所著《历史哲学概论》、《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中国之悲剧》、《中国文化之前途》及《世纪中文录》等,久为学术思想界所推重……这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最努力的一大贡献,我们谨以兴奋感激之情,介绍本书于读者之前。

现在我们也以兴奋感激之情,介绍本书于大陆读者之前。

先父胡秋原先生1910年生于湖北省黄陂县,2004年逝于台湾省台北县,为一强烈之民族主义者及爱国者。因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

中国而放弃继续在日本完成官费大学学业,在上海开始其终身之笔墨生涯。因蒋介石对日之“不抵抗主义”,而参加 1933 年之福建事变反蒋,失败后流亡海外。因 1937 年卢沟桥事变而返国参加抗日战争。1950 年后定居台北。生前在台湾首倡两岸和平统一,1988 年春与友好组织“爱国统一联盟”,并于同年秋以八十高龄之身,不顾自身安危,冲破重重阻挠,亲赴北京及大陆其他城市,为呼吁国家之统一奔走月余。此行由家母敬幼如女士陪同,采禾随侍,曾被誉为“破冰之旅”及“胡秋原震撼”。此后,先父即屡与采禾商量将本书在大陆出版以飨大陆同胞之愿,频以出书事宜委重任于采禾,更于遗命中嘱之。对其著作在大陆发行之指示与交待为:“文字可以删节,不得修改。”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之大陆首版《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即是遵守先父遗命与原则而进行,以新貌与读者相见。除以简体字横排,及相应之排版、标点等调整外,尚有以下之处理:(一)为遵循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国家政策,在内容上,与本书主题无关之处加以适当之删节。(二)为保留本书出版之历史原貌,大陆首版节录了原书之四篇序言。(三)凡由于原文之删节而编者必须增加之字词或说明,均以【 】括之,以别于原作者之文字。(四)1949 年以前之纪年依照原书,其后之纪年改用公元纪年。(五)由于版次之变化,页码提示与标题均有相应之更动调整。索引部分,人名、地名、事名、书名、外国人名按简体字笔画重新排序,并有所修订;页码作相应变动。所有插图照录原书,但增补其遗漏之图版页码及图片注释。以上各项均不另作说明。

胡秋原先生巨著《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陆首次出版发行,首先要感谢北京中华书局和历史部编辑同仁。一年多来,各位编辑为出版本书忙碌,耐心敬业地筹划,精心精密地编辑,在此特别致以衷心的感谢。

谨以本书在大陆发行的首版,叩献于先父胡秋原先生灵前,作为他今年百年冥寿之献礼。

胡采禾谨识

2010 年元旦

## 第四版序言【节录】

我曾想将我的思想和心力，集中表现于一部中国通史之中，这一部书是此通史之古代篇。第一版出于二十年前，绝版已久，现在我自印第四版，特略【作说明】。

### 理论历史学

我为求解决中国出路而求一可靠的理论，经过三时期。开始是社会史论战时期，我依据及修正唯物史观，此即《中国社会文化史草书》。其次，民国二十四年后，我自立系统，此即《历史哲学概论》。最后，经抗战、二次世界大战，经【国共内战】与美俄冷战，以及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对世界史再为比较研究时，对《历史哲学概论》有所补充，乃有我第三期的理论，即本书所应用的理论。此是综合一、二两期之见解再加整理的，自更周到而有概括力，可谓普遍的历史哲学或理论历史学。此简述于本书首节，散见于全书，亦曾在其他地方先后说及。此处是其纲要。

一、人是创造文化的动物，因而为历史的动物。人类除生物的需要外，尚有德性（价值判断，美善观念，同类相亲）、理性（知性，同异辨别、关系连络）之能力。二者是文化创造之原动力，使人类有创造文化之可能；而环境对需要之供给有利的机会则使此可能成为现实。文化指人类一切德性与知性之制作或创造，包括技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一切学艺之系统。文化与文明可作同义解。文化使一定人群结成一定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们应付环境的工具，发展人类性能，实现更大自由之工具。人类创造文化以后才由自然进于历史，故人亦为历史动物。人类发明文字以后才由先史时代进入历史时代。当一定之语言及其文化将不同的部落结成民族时，文字更加固定之。人类史即文化史，亦即各民族文化生长、变动、交涉、竞争之过程。

二、内外构造与因革损益造成文化之变动。所谓环境，包括各民族内外两方面之构造。外部环境有自然、国际关系；内部构造即各民族之人群及生

活于其中的文化形态(技术、制度、学艺)。此内外因素是不断变动的(例如内部人口之增殖,外部生活资源之丰啬,友敌民族之出现)。这便引起新的问题,需要这民族之人群采取新的行动以解决之,而此解决,亦即对其现存社会状态,通过其固有文化而采取因革损益之手段。此因革损益造成文化创造,即文化生长与变动之过程。在文化变动中,思想是最能动的因素,唯其效果亦受一般文化状态之节制。

三、文化兴衰与社会治乱。一社会内外形势经常在变动中,亦在相互作用之中。种种因素相生相克,对文化创造形成有利与不利之结果。内部的技术、制度、学艺三部门是否调和,造成创造力之强弱,以及因革损益之成败(适当与否)。此强弱、成败与外部环境之有利或不利相合,则影响文化成长之迟速、兴衰。而文化之兴衰,因而因革损益之成败,则积成社会国家之治乱。而此其结果,亦由全社会全民族承受之。

四、民德士气是一国文化创造力之保障。一社会之道德心以及理智状态为创造力之原动力,二者亦互相作用,但道德更为重要,因道德衰落后,理智亦必麻木而错误。在一社会之技术(人与自然)、制度(人与人)与学艺(人与自然、人)之三部门中,对技术与学艺起维护、协助之作用,而保持二者之调和者,毕竟有赖于制度。三者并非抽象概念与物质,而是有人主持及活动其间。主持及操作制度者是统治集团,主持技术及学艺者是知识分子。当一社会道德心强盛时,不仅保持社会之内在亲和,而且相互关切共同之利害,因而尊重学问与人材,新的思想与观念,因而调节制度技术学艺之调和,而有文化之兴,国家之治。道德之衰落常起于统治集团与既得利益之势利主义,此使彼等由私而愚,或由私愚而贪而暴,并污染社会,毒害性灵。此时常赖知识人提出因革损益之道以救之,通过社会之力以救之。如不能救,甚至知识人亦势利腐化,社会必乱(内战),而统治集团亦必终被推翻。而乱的时间和空间之久广,决于腐败程度之深广。然起而代之的新势力必为多少接受新观念,即新文化者。于是此社会仍有再兴、再治之可能。学问是一民族之实力,道德则是扶持力,所以善恶消长与国家兴衰有密切关系。然一民族不是孤立的,他还有他的外部环境。各民族之兴衰、成败、治乱,相遇而相互作用时,造成世界史之变动。

五、各民族之文化成就及其命运,在世界史中结算。人类之心智相同,在相同自然环境下,各民族之文化表现极大之类似。然各民族之大小,以及

内外形势所造成的文化创造之机会,进步与落后之状态,相互间和平与战争之关系,战争胜败之结果,则大不相同。世界史是许多民族以其所创造的文化登场之舞台、运动会和战场,而各民族之文化力是其竞争力。于是各民族文化发展之迟速,治乱,兴衰,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一民族之命运。

在历史之一定时期,一民族文化之发展兴盛,不仅造成自身之权力地位,而且其文化成就亦有为其他民族所仿效之价值,或进而扩张其文化之影响力,因而树立其文化的霸权。然此握文化霸权之民族亦常因垄断财富与权力而造成自身之腐败,或狃于一时成就之经验,不能进一步因革损益以适应新的需要,造成自身之衰落,内争,反抗而瓦解。于是此文化霸权可能为更落后民族所破坏,或受相等势力的民族之挑战,或被优势文化之民族取而代之。在政治霸权文化霸权之起落与转移中,造成许多民族之融合、扩大、分离、独立与盛衰,或不幸而使许多民族之人群及其文化归于沦亡与消灭。然一民族之文化如仍有价值,而此民族有独立之精神,自仍能经适当的因革损益而复兴。此种政治、文化霸权之兴衰与消长,造成世界史构造之变形;对许多民族而言,亦是其外部构造。我将世界史构造之变形分为九大时期。就将来而言,世界和平与人类毁灭皆有可能。

六、历史学之性质:是科学,文学,还是哲学?一切科学皆以概念概括事实,研究概念间之因果关系,以预见事实之因果关系。一切文学乃以想像组合形象,加以描写,诉诸感情,不必实有其人,或确有其事。史学必须描写历史上重要人物之活动,有同于文学,然必确有其人其事,且在事实之发展关联中叙述之。故史学有文学性而与文学不同。但史学之最大用处,毕竟在求一般人民生活方式之变动,即文化兴衰,国家治乱之法则,借以鉴往知来。故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个别社会科学研究现代社会各部门(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人类活动及其法则,一般社会学则是一种综合的考察,以社会组织、文化及其变动为对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者,一是自然现象可作控制的观察实验,而人类活动仅能对若干可计算之标志加以调查,如人口、所得、投票率、失业率及使用访问、民意测验之类技术。而要研究社会之变动,自不得不研究一个社会的前期状态,此即历史。二是自然现象无所谓价值判断,而社会科学则不能避免价值判断,尤其是法学主要是一种规范科学。然价值标准之规范又如何研究呢?这可由比较各民族之价值观念,研究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求其不变原理,此即历史。此是说社会科学不能离开



史学。

可是,史学又与社会学及个别社会科学不同。他不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人类之活动的,而是对过去到现在人类活动之连续过程作一种通观,记述及说明现在之所以形成,因而考察其将来之可能趋势,俾能选择一较好之前途。首先,史学不仅研究过去之集体情况,且须研究有重要性之个人。此皆不能直接观察或询问者。其次,历史系由各方面的人力所构成,而人力如何使用之流动性甚大。故史学虽是一种科学却不能成为严格的科学。历史可以说明人群各种可能之前途,而选择之,又决定于人,此则每一个人亦有其或大或小之份量,个人与集团如何选择则与思想及价值判断有关。科学不作价值判断,而人类文化及其活动,前途之选择,根本包括价值判断,故史学必作文化价值之判断。所以史学必然成为文化哲学——文化批评之学。一切社会科学也都不能避免价值判断,故史学除自身为一种科学外,又为一切社会、人文科学之基础,犹物理学为一切自然科学之基础。

七、史学方法论。总上所言,史学研究治乱兴衰之故,因革损益之宜。此史学之性质,决定史学之方法。惟其史学是不严格的科学,必有严格方法论,俾能对可确定者确定之。自然科学方法以观察,数学,实验,推理,求精密之概念,及概念间之不变的因果关系。史学之目的与科学同,然历史事实不能直接观察,只能根据间接资料之史料,即文书与古物。数学与实验用处甚少,或根本无从适用。访问、民意测验亦无从适用。故史学主要是一种推理的科学。史学家据史料推理,有如法官依据证人证物判案。此种推理之所以可能,即因人性有基本之相同,而人类活动之各种方式,已有各种社会科学,如人类学、考古学、古文书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提供比较的解释与说明。知识愈广博,愈有助于推理,避免误信和武断。

一般所谓史学方法指史料之批评、考证。此仅史学方法之初步,确定个别之事实而已。史学方法之第二步必须借助各种补助科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书学等)及社会科学之解释、说明,将个别之事实连结为事态,尽可能看出事态之关联、构造与变化。史学方法之最后一步,在对于一时代一社会内部的构造(社会之道德知识状态、技术、制度、学艺)与外部的构造(地理的,国际的),内部的,外部的各种因素,以及内外之间的相互作用(模仿、学习、和平通商与战争)加以考察与联络,理解其先后的因果关联与其一定时期之总结果。此方法论之应用,证明道德与理性为文化创造之根本动力,势

利主义则为破坏力,并证明个人与民族求自由之愿望亦为历史法则。

八、历史学不仅要说明兴衰治乱之由来,最后还要评价文化之成就与得失,为因革损益之根据。此涉及科学技术,行为制度,文学艺术之价值判断。我由史学与科学、哲学之合作建立目的论,说明真善美之原理,而以正义、和平与文化创造力之解放为文化批评之标准。因果论的史学方法论与目的论的价值判断论合为理论历史学之基础。

九、全部史学方法之使用,皆赖比较之功。史料之鉴别须比较,事实之关联,变动,及其因果关系之判断须比较,文化之评价亦须比较。故比较实为史学方法之中心,使推理有其根据,其重要性更甚于生物学上之比较。

然史料愈广,比较愈周。此所以历史研究终必以一定世界史之知识为前提。过去之历史多为帝王之家谱,无关于一般人民之生活。后来又有以地理(巴克尔)及经济(马克斯)解释历史者,此皆仅外内构造之一部分。近年来有行为科学派。其实行为科学只能说明一定之心理现象。人类之行为系在历史构造即文化方式中进行,以思想为动机,并具有价值之趋向。行为科学对此三者皆无用处,也就对研究人类及中国之前途没有用处。

以上纲要,包括史学方法论与价值判断论,历史构造之内部与外部,静态与动态,微视与巨视,故称“理论历史学”。此理论历史学乃由比较世界文化史与文化社会学之长期研究来,亦足以说明和预见世界历史之变化的。

### 本书之结构

过去想写一部世界史而未成,现在则应用我的理论历史学于中国史,要点如下。

一、中国历史就其外部构造而言,可分三期。甲、自远古至春秋为中国光荣孤立时期。起于本土(江河上游),在和平劳动中创造,使用表意文字的中国文化,给与中国文化以最基本特色。乙、战国以后,匈奴入侵,使中国历史进入亚洲史时期。丙、元明以后,是中国历史渐入世界史时期,而明清闭关,自限其智能,清代中叶以后海国东来,是中国历史被动的正式卷入世界史时期。(此三分法,是我在抗战后期慢慢想出来的。直到我写完本书上卷时,才发现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早有类似分期。)

中国历史就其内部构造而言,可由中国国家性质、统治机构、经济程度三方面观察。以国家性质而言,由黄帝到尧舜,是部落同盟时期。夏商周是封建国家时期。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帝国时期;清代中叶以来,是此统一帝

国瓦解建一民主共和国时期,但遭遇种种挫折。

就统治的机构言,五帝时代,教权性的知识分子即统治者(主持祭祀者)。在三代,贵族知识分子为统治者。在战国时代,平民知识分子抬头,中国趋于无阶级的齐民社会和统一的郡县帝国。首先由于对外关系,武力重要性增大,武力组织者成为皇帝,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人民参加政府。两汉以后,为皇朝与知识分子二元之局。皇朝之兴起与腐败,帝王与儒生之合作与分离,知识分子创造新文化,蛮族之入侵与同化,构成治、乱、治之循环。

就经济程度而言,三代是封建经济时代。战国时代都市勃兴,封建时代趋于结束。秦汉以来,中国大体上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但腐败所造成之民变与蛮族入侵,以及明代之闭关政策,使中国未能向高级资本主义发展。西帝东来,日帝继起,阻碍工业之发展,进入殖民地化。

二、两汉是中国历史之模型。此后中国历史有三大循环如下:

秦汉——三国、晋——五胡、北魏、六朝

隋唐——五代、北宋——辽金夏蒙古、南宋

元明——南明、清初——鸦片战争以来

就以上第一期而论,秦朝建立统一,然其制度不能适应统一之需要,汉能革其弊,始能建立统一帝国。东汉因腐败而分裂,中国知识分子退而在野,创造新的文化。然晋人不克负荷,仍复腐败,天下大乱,五胡乘之而入中原。新的文化潮流与力量,再造隋唐之统一,而再反覆前期之过程。元明统一中国后,亦复如是。不过,清朝统一中国,到了十九世纪趋于腐败后,不仅有汉人之复国运动,而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了。中国历史之外部构造完全不同,也便不会有过去的循环了。

三、本书分三卷。上卷古代篇包括远古文化、文字发明,古典文化之形成与发展至秦汉时代。此中国文化因系在中国本土独立和平的对自然环境所创造,有无阶级,非宗教之人文主义之特色,复以表意文字凝结之,有极大之稳固性。此经三代发展为周代之古典文化,而在春秋时代开花。孔子为此古典文化之代表者、集成者及传播者。至战国,外而匈奴之威胁,内而都市之发展,促成秦汉之统一。秦滥用皇权而瓦解,匈奴之威胁更为严重。汉代能对内外情势为适当之因革损益,所以能上继先秦,下合六国之文化而发展一种“大汉风文化”,对周围亚洲诸民族发生影响力,同时亦不断吸收域外

文化之成份,使中国成为泱泱大风之国。直到清代中叶以前,中国社会与文化只是在此文化中之破坏与重建,所以汉代社会文化是中国历史之模型与骨干。此大汉风之文化,自是中国知识分子之集体创造。此“大汉风”一词虽是仿照德国史学家 Droysen 之“大希腊风”(Hellenism)一语之用法(此词意即希腊文物及其风尚之普及,狭义指亚历山大东征至罗马帝国成立间之希腊文化,广义则为与希伯来主义对立之概念),但大汉风之持续的效果却又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文化之价值须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加以比较而定。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度之文化皆起于外来民族征服原住民及其文化而发展的,皆起于宗教与阶级。而中国文化则起于本土,起于史官,起于天文观察,故无奴隶制度,宗教观念亦淡薄,而表意文字更增其团结力。三代以来,神的观念日益为人的观念所代替。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与同时希腊印度相比,我们的长处多于短处。希腊人的科学发展在大希腊风时代。但将我们大汉风时代与其相比,不如者只是几何学。而在其他天文数学工艺各方面,如张衡、刘徽等人之成就,在同时代希腊人罗马人印度人之上。而我们在人民至上和言论自由两方面之理论与实行,更非希腊人罗马人所能及。而太史公之史学,是要到十八世纪西方人始可望比肩的。

四、中古篇论三国至宋末。叙述之层次仍将如上卷。在过渡时代,则提出关系后来之重要事实,如三国前后,诸葛亮对曹操抗争之意义,诸葛之相业,三国之开拓,建安文学,荆州经学,玄学、史学之流传,九品中正与正始风气,佛教之东来与渐盛,塞外民族之酝酿新的风暴。而于一个统一的朝代,则述其时皇家与知识分子之概况,外围的民族,内部社会状况,民风士气,技术,制度,学术之成就;特别注意其能否对内外情势作适当的因革损益,以及在乱亡后复兴力量之由来。司马家乃曹操主义者,荒淫无耻,不知因革损益之道,只维持了三十六年之统一,而有永嘉之祸。五胡之由来与起伏,鲜卑南下后柔然突厥之活动,与后来之关系亦大。南北朝分裂后,北方士族之自保,中原士族之南迁,保持及扩大了中原之文化。北方礼学、南方玄学之发展,南北佛教亦分途发展,然又皆趋于合流,此隋唐统一之源泉。而促成此合流者则为史学。

唐代开国君臣是深于史学的,故知因革损益之道。为应付突厥而通西域,租庸调之制,科举之制,都甚成功,故能再建比汉代更盛大之大汉风或大

唐风之文化。运河开通后,继之以市舶司之成立,国内外贸易之发展使经济结构大变,唐初租庸调已不能维持了。唐玄宗在国力最富庶之时,不能为进一步之因革损益,唯用小人而肆贪侈。而此时阿拉伯(大食)已兴,其技术非突厥可比。唐军在怛罗斯为大食所败,安史乃乘机为乱(杨贵妃适逢其会而已)。自此北方残破为游牧民半游牧民活动之温床,而藩镇亦因此尾大不掉。中国经济文化之中心逐渐转移于南方,海外贸易由此益盛。此不仅为支持国用之重要来源,而且促进唐宋间之商业革命。飞钱、交子、会子先后出现,罗盘亦与海运俱来。但安史乱后,唐朝虽在财政上有相当之因革损益(税制、预算),然不足适应需要,而首先起来亡唐之黄巢,并非农民而系富商。中国再分裂为五代十国。首先是强盗朱温。后有沙陀之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造成中国国防之致命伤,先后成为辽金之祸。乘南北朝大乱而兴的释老二教在唐朝仍甚流行,唐末尤盛。循此趋势,中国非不可分裂为许多民族国家。而商业发达之要求统一的市场,杜甫韩愈之再振儒学,与唐末五代印刷术之发达,则是宋代再建统一之物质与精神原动力,也是宋代文化学术发展之基础。然中国已失去长城之屏障了,先有辽夏两个外患。赵家惟惩藩镇之祸,以集权牵制为能,岁币外交为安;范仲淹之改革不行,王安石之改革不得其道转成小人聚敛之术,而外交上复无远谋,因成靖康金人之祸。幸此时中国之科学技术已有新的发展,海运亦增加财源,此加上长江之险,能与金人蒙古抗衡之故。然南宋唯以偏安为得计,自毁长城(杀岳飞),天下中分。贪风大涨,诛求遂急。既而蒙古灭金,已能“用北方之马力,兼中原之技巧”;及蒲寿庚以海舟降元,宋朝已非文天祥所能救了。

自三国至宋末,是欧洲三世纪至十三世纪之时。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由军人专政而腐烂,蛮族开始入侵,采行基督教,帝国二分,西罗马终于被蛮族灭亡;其后三百年为黑暗时代。东罗马帝国保持古代西方文化之干枯形骸。西罗马之亡有如西晋,东罗马亦有似六朝。然西罗马死而不复生,西方归于日耳曼人;而六朝文化仍大汉风之流韵且甚活泼,且重造唐代宋代之复兴与光辉,此即中国文化稳固性之证明。在中国之六朝时代,为印度文化黄金时代之笈多朝时代。唐代,在印度为戒日王时代,为佛教最后之盛期;在欧洲先为黑暗时代,后有法郎克人之建国。其时世界文化史上与中国并驾而极活跃者,实为阿拉伯人,一时建亚欧非三洲大帝国,且能在叙利亚吸收大希腊风之文化,于败唐军后吸收大唐风之文化(造纸术自此西传),因而成其盛

大。而法郎克实在其包围之下。唯法郎克人在七三二年一战获胜，始得保持基督教之势力，而有夏理曼帝国，然亦方由草昧进于文明。至十字军之战，欧人始由阿拉伯人学习，三百年后有文艺复兴。综此期世界文化而论，欧洲除东罗马尤士丁法典外无甚可谈，印度佛学为中国所吸收，阿拉伯人方吸收中国之文化，中国之科学工艺哲学史学文学，皆为世界之冠。

五、下卷自元代至现在，我称近世期。首先我要说到，西方人多以一四五三或一四九二（发现美洲）为近代史之始，而以一八四〇年为中国近代史之始。在后一点，实甚荒谬，此乃以西洋人侵入中国以后，中国始由中古进入近代。其实西洋人之所谓近代现代，乃指其民族国家之成立，或其近代语言之形成而言。我以为近代史应以世界交通之形成为断，而此乃以蒙古混一欧亚开幕，而中国现代语言，省区画分，固亦皆由元代始。元代于世界建立“蒙古式的和平”，开东半球之海陆交通，促进西方文艺复兴。然在中国实行落后的四种姓之制，迷信喇嘛教，而以江南为殖民地。此断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之民族主义运动遂亦发展于江南。及元人海运被切断，蒙古之四大汗国之崩溃由中国开始。中国由南而北之统一，亦自明代始。在世界大通之时，朱元璋不知利用开发，反行闭关之道，使中国人开先之航海事业，亦因“祖制”而中止，而西人则由航海而发展，此为中西盛衰一大关键。宦官贪残，八股士大夫之不学无耻，援韩之役，散兵溃卒散处辽东助满清以军力，而贪污诛求激成民变，造成满清入关之机会。满清虽为中国扩张版图，然一切继承明代政策，益之以文字之狱，知识分子不为八股之禄蠹，即埋头于文字之爬梳。文化创造力早在停滞状况，遂使世界大变之时，中国人失去应付或因革损益之能力。

此近世期与西方比较，可分三个阶段。自元代至明代中叶，是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之时。元代继承宋人文化，水准远在西方之上。这只要想到蒙古的世界武力，李治、郭守敬的数学天文，马可波罗虽然夸张然而亦见显著悬殊的比较，即可了解。明朝接收元朝的遗产，一时富强甲于天下，这只要想到十五世纪郑和的世界航海，即可了解。但是明代以来，中国方面，因闭关、八股、太监之三害在精神上趋于萎缩；王学乃针对此弊而兴，然因无物质方面之基础未能结实。另一方面，欧洲人则有三利促进其发展。一因十字军及“蒙古的和平”，十四世纪中叶以来，义大利诸城市已开始一新的思想运动，即所谓文艺复兴。二为英法百年战争终结，欧洲成立两个民族国家，继

而西班牙葡萄牙由回教徒解放而成立民族国家。三则葡西两国从事航海，宗教改革促进民族国家之航海与殖民竞争，促进知识的追求。“知识即权力”的口号，促进了科学之发展。

虽然如此，十五世纪土耳其人以优势船炮攻陷君士坦丁。至十六世纪，苏莱曼的土耳其还是欧洲最强之国。明清之际来华西士的科学知识，其平均水准并不超过中国，如过去许多人所皮相观察的。一方面，中国之停滞，另一方面，西方之突飞猛进，在一六〇〇年双方犹在平等状态。葡萄牙人逐步夺取回教徒的航路，西班牙与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大破土耳其海军于勒班多，十七世纪西方科学革命后的继续进步，才使西方确立其技术的优势。虽然如此，明末诸人因外患内忧的刺激，西学的启发，在学问亦有新的努力（复社）。而在一六六一年，郑成功仍能击败当时海上之雄的荷兰。此见其优势是有限和不定的。

然自清人人关后，中国有四十年之满汉战争（自扬州七日，至三藩之战与合并台湾），及继续的准噶尔战争与回疆战争，以及文字狱。而西人则设立科学会（如英国王家学会），有计画的发展航海贸易（如克伦威尔之航海令），有数学上决定性的进步（微积分），而英国在名誉革命后即保持国内的长期和平，一意对外发展。这两种方向不同的活动，才使西方资本主义飞跃发展而不遇丝毫之阻力，才使西方在技术上决定性的压倒东方。虽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仍对中国文明表示极大之敬意，实际上他们在知识上已超过中国了（四库全书是我们知识的代表）。美国之独立，英国蒸汽机开始的工业革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法国大革命，三者同时促进了高资本主义和西方市民阶级的财富权力，而此对前工业的东方则变为帝国主义。此时欧洲列强在瓜分土耳其，英法在争夺印度。马戛尔尼早已看出西兵东来，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于是拿破仑战争终结后，英人以西方领袖鼓浪东来，将对付印度和土耳其的办法施诸中国。这一世界历史形势之转变不仅为当时“满大人”所不知，就是今天只知仅凭《夷务始末》资料，“现代化”的观念，来讲禁烟和“剿”“抚”得失，讲近一百余年中国历史的人，也只是管窥蠡测的。

六、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与国力，在世界长期处于先进地位。在科学民主方面亦复如此。但十七八世纪以来，世界发生大的变化。西方诸国日益取得技术之优势，终于征服世界，中国成为落后国家。此其原因，即中国之

闭关八股造成停滞；而西方之航海与科学造成资本主义之发展，促进工业技术之进步。东方愈落后，西方之发展亦愈为迅速。我们在过去所遇外力，为塞外游牧之族。我们因革损益之道大致不差，所以能够发展大汉风的文化。中国即令瓦解分裂，乃至受外力或外来思想之征服（如佛教），但我们终能对自己文化再作因革损益，发展新的文化运动，重建中国人之统一的精神，复兴国家，如唐，如宋，如明，皆是如此。近百余年，我们首先遭遇的外患为海上工业国家，遂成为被侵略的对象。落后不是不能克服的。决定的失败在我们知识过于不足，不知正当的因革损益之道。在开始，还想以传统的应付匈奴、突厥和契丹的办法抵抗西方海国。等到这完全失败后，便完全丧失抵抗的意志。

### 新 版

新版与原版不同之处，除了更正错落或模糊之处以外，在内容方面，我仅在原书每一页固有地位中使原来的意思更为清楚。这包括用语轻重之改动，原文前后之移动，间有数字到四五十个字之删除与增加。又图版增加了两面古代舞图。又插图增加了一幅《丝道图》（三六七页），又原来我自画的《汉唐西域交通线图》甚为拙劣，换了一张，并加了一张《葱岭图》（五九一页）。而此三图，是应当合看的。又原书引用来源附于正文，附注大都是说明正文的。有五六个注或因有新情况，或有新阅览，应予说明。首先是第六章注五二，论述外国之汉学研究者。在我写完此书时，只看到李约瑟《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一九五四）。我在书中正文提到他，注五二说西方汉学家应推沙畹、洛佛、高本汉三人最为精博。但到一九五六年李书出第二卷，一九五九年出第三卷，去年出到第五卷，我要说这确是不朽的大著。当然，他的书是取材于西方以及东方汉学家的书，那些西方汉学家也有许多是得中国人合作的，而李氏自己的书也得到中国人的合作。但他组织为堂皇之大著，实西方汉学家著作之最高最大成就，亦见中国文化之辉光。我虽然来不及引用他的书中材料，不过他注意到的事，我的书中也都注意到，在此新版中，我只引用他的两句话，一即中国的赤道天文学是欧洲现代天文学所采用的。二为磁学与声学（等律），中国均有启发于西方。李氏大著在未全译之前，可看他的“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d”（R. Dawson 编，“The Legacy of China”，Oxford, 1964）。而其书最精彩处，我在《书经日食》中有简要介绍。



其次,与西方人汉学著作有关者,在注一八九提到西方关于中国天文学著作,至少尚应加:

Herbert Chatley,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y" (1939)

Henri Maspero, "L'astronomie chinoise avant les Han" (1929), "Les instruments astronomique des chinoise au temps des Han" (1939)

Giogio. Abetti,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1954) (关于中国之论述)

又注二〇二关于中国艺术著作,至少应加:

W. Willetts, "Foundations of Chinese Art From Neolithic Pottery to Modern Architecture" (1965)

Werner Speiser, "The Art of China: Spirit and society" (1960)

又上册第五章注八,说到联合国文教会世界通史计划,该书已在一九六九年出齐,其起讫与当时略有出入,因有余白,已补记于原注之后。

还有第六章注一八二、注一八三,在我看了朱载堉《乐律全书》,《大英百科全书》论中国音乐,及李约瑟书第四册后,有所删增,并改用董榕森先生一图。又补记一九六〇年国际长度定义。

此外,新版增加了一个索引。初版出后,我决定补一索引,并已请人在香港就近为之,作好后已将索引稿寄我。我记得似乎未曾整理,最近拟清出整理,竟未发现,因曾迁居,方疑遗失,但又发现香港一种版本上记有“上下二册索引,兹因某种原因,索引原稿失去”之语。不得已,特烦杜聿新先生重新作一索引,特志最大谢意。

看历史书手头宜有一中外大事年表。虽然书中是用同时比较法的,【本书】已有两个对照表(一九三页以下,五三二页以下)。兹将旧作《历史哲学概论》中的中外文化史对照的简明年表稍加补充,分三期刊于每卷之末。欲知年号,可参考《辞海》附录。与外国对照可看 William L. Langer,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Chronologically Arranged" [1<sup>st</sup>-5<sup>th</sup> ed., 1940—1980]。

一个人总是自己的书的最坏校对者。此书初版得无大误,系赵滋蕃先生之力。初版出版以后胡哲齐先生寄来一刊误表,曾于再版时据以改正。但杜聿新先生在第三版中仍发现错字不少。重印本系就杜先生本付印,又由梁先进先生负责校对,均此志谢。